

“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侯晓佳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的日本侵华研究学会 2000 年 9 月 28 日在京联合召开“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台湾、南京、天津、唐山和美国、日本等地的学者和战争亲历者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白介夫会长简短致辞。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吴天威教授和朱永德教授介绍了日本朝野一系列歪曲抹煞侵略战争历史罪行的新动向：多家出版社借修订教科书之机，淡化甚至抵赖侵略罪责；日本出巨资在美国兴建了两处日本人战争受害纪念馆，引起居美华人的极大反感。华人组织正在多方呼吁筹建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以向美国和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没有“集体健忘症”，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中国和亚太地区人民是真正的受害者。据悉，日本政府还不惜耗费几百万美元，筹备在 2001 年庆祝旧金山和约签订 50 周年。这个和约使日本得以利用别人的软弱和短视，轻易逃脱了对战争罪责的认真清算，实际上是战败国对某些战胜国的战胜，无怪乎日本要大庆特庆。

与会者着重从抗战史料与史实的维护、日本侵略暴行研究和日本右翼的猖獗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老抗日游击队员白竟凡女士讲述了她的抗战经历，对日本政府始终不承认不清算种种侵华罪行深感愤怒。表示一定要尽微薄之力，将十几年来搜集的冀中抗日史料和一部分养老金，捐给纪念

馆筹建委员会。她动情地说：“我们还比较清贫，但要尽一份心，争一口气。”

与会人士认为，战后中国因种种政治原因，坐失了调查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的时机，甚至错过了挽救维护战争史实的史料的最佳时机，深可痛惜，也应深自反省。若不急起补救，子孙万代不会原谅我们。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了5年来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从万人坑遗址发掘及其法医学和史学的鉴定，到遗留至今的弹壳、炮身、日记、幸存者证言等等，2000多件新发现的史料，多方面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

北京大学丁则勤教授在会上详细分析了日本皇族和南京大屠杀之间的直接关系，尖锐揭示了那场反人类暴行的罪责何在。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占领中国的首都，就是灭亡了中国。皇族认为这种巨大荣誉，不能让平民司令官获得。在发布进攻南京命令的第二天，天皇特命自己的叔父接任主攻南京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攻陷南京后皇族要骑高头大马从正门一路入城，为保证皇族安全，就必须彻底消灭已停止抵抗、放弃武装、甚至脱掉军装的中国军人。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从此开始，所有参战的日本师团都把扫荡脱掉军装的中国军人当做绝对命令。这几天的屠杀最为肆虐残暴，而皇族问题使日军其他长官不敢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场屠杀。更不能忽视的是，在进攻中国时，天皇任命皇族为进攻南京、驻扎南京和屠杀南京的主官，任命皇族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而在对美开战时，就换成非皇族的总长和司令官。这说明天皇充分意识到战争责任的严重性和对美战败的可能性，也充分表明他对中华民族的歧视之深，武力亡华的决心之大。

丁教授的发言引起热烈反响。与会者讨论了日本天皇制、日

本传统和国民性与南京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之间的内在联系。

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研究员从日本历史的角度剖析,日本历来宣扬天皇是世界的主宰,灌输皇室观和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只要服从天皇的命令,无论对错,都不犯罪,且死后会升天,自己及后人会受朝拜,子孙将成为神社会员,享有特权。正因如此,他们对死亡有着偏执的狂热和无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伯锋先生认为:日本军人集团如此残酷,不能仅从战场报复心理解释。没有长期的思想熏陶,不可能如此残暴。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主流意识已经军国化,国民从小就受军国主义熏陶,并且是军国主义的受益者。日本近代一直对外侵略,谋取利益,尤其以中国为对象。每一场战争都使他们尝到甜头,所以绝对支持天皇,狂热地支持战争,并视其为圣战。现在他们仍认为天皇是神之选择。把弱肉强食视为生存法则,失去了人与人相互亲善的最重要情感。作为一个民族,日本整体上没有对侵略战争深刻反省。

军事科学院罗焕章先生在《日本右翼和政要为什么要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中指出:南京大屠杀的规模是世界空前的,超过了德国对犹太民族的暴行。日军在中国首都 6 周内屠杀了 30 余万人,大量房屋被毁,10 余万妇女被蹂躏,仓库财物被抢劫一空。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浩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居之芬副研究员几年来致力于搜集和研究战时日本强制华人做劳工的史料。据她考证,从 1935 起到 1945 年 8 月,日本在华使用了 1500 万左右强制劳工。其中在东北使用劳工 1000 万;1941 年后在华北强征劳工 300 万左右;1941—1942 年华北用劳工大约几十万;华中和华南向上海输送劳工 10 余万,上海本地及矿山和铁路用劳工约 150 万。

陈平研究员根据亲历亲见和多年研究,讲述了日本在侵华战

争中制造“无人区”的情况。郭成周教授在报告中,引用大量新发现证据和数据,从医学角度揭露了日军对华细菌战的种种罪行。

本次会议对抗战史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熊玮教授从 1931 - 1945 年间中国的歌曲入手研究抗战历史,探寻这 14 年间的歌词所反映的中国人被日军屠杀、虐待的情景;所鼓励的抗日精神。还有学者提供了对宗教界的抗日,如佛教、基督教、道教抗日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曾业英研究员以“大,深,实”概括了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问题。即要扩大研究领域,以往我们着重于政治,近几年着重于日本暴行,经济掠夺,文化奴役。现在应进一步扩大到日占区的农民迁徙,日本开拓团来中国圈地、淘金等情况。不仅学术研究要深入发掘利用史实,政治斗争上也要如此。史实要真实准确,不要似是而非。

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引起中国学者的严重关注。外交学会田培良先生今年 1 月在大阪目睹了日本右翼集会,并参与了交涉。他介绍了自己所知的相关情况。

朱成山分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五点新动向:由个别抽象的否定转为全盘具体的否定,从所谓学术研究的单一途径转为以社会活动扩大影响的多种途径,从个别右翼学者的行为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从气势汹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策略转为普通政治要求的隐蔽策略,从少数人变为各阶层组成的一大批社团力量。其成因有历史因素、现实因素、政治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有国内因素,也有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因素。现实因素有三:国内国会政治保守势力的发展,使右翼势力明显强化;日本社会和法律容忍右翼团体活动,使和平团体力量弱化;日本大国主义倾向抬头。他还建议成立专门机构研究日本右翼的活动,并广泛支持日本国内的和平进步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良志也认为日本右翼近来已成为左右日

本政局的重要力量。右翼人数不众,但他们多为社会精英,很多是内阁官员,甚至是首相。他们的动向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晴雨表。日本政府不便说的话,由他们来表达,影响国民,然后再成为国策,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源是日本的皇国史观、军国主义观、民族优越观和大东亚史观。他还认为战后亚洲被侵略国家没能够团结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庇护和纵容,没及时打击日本右翼,是值得反思的。我们今天对日舆论导向非常重要,不应欠缺战略考虑,缩手缩脚。舆论对于收集和维持史料,追究日本战争罪行、民间索赔、钓鱼岛领土主权等战争遗留问题都缺乏关注。报刊对于日本右翼势力揭露不多,也不及时,这些也是应该反思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日本右翼的策略是否认侵略史实,我们的针对性不够。日本形成了一套史观理论,而我们的研究理论性不强,习惯于政治大批判,不注意摆事实,讲道理。首都师范大学的徐蓝教授指出,德国右翼势力也在抬头,右翼的复苏在90年代发生,值得我们放入国际大背景中研究。朱永德教授扼要说明了当初在冷战国际背景下,美国对日绥靖,停止日本赔偿的过程。为把日本培养为反共基地,美国政府限制国内发表揭露日军暴行的资料。

旅日学者王选介绍了以浙江地区为中心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索赔诉讼的情况。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了近二百名日本律师的支持,其中不少律师自愿为中国人辩护。海外华人对索赔诉讼给予了巨大援助。她指出,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诉讼不单是一个历史问题,还要作为人道主义、人权问题来对待。时机正在失去,取证越来越困难。学者专家不要只会坐而言,必须起而行,搜集证据,用研究成果来推动民间受害索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吴广义先生主张将对日索赔纳入我国对日外交战略,在毒气赔偿、邮政储蓄追讨和被劫掠文物的追索等方面,应以国家为主体。个人索赔也应得到国

家的支持。同时应加强同日本进步团体、在野党派、有正义感的专家学者和友好人士的联系,支持日本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应积极支持海外华人,维护史实和受害华人的权益。

与会者对日本右翼问题有激烈争论。有学者反对用“右翼”的概念,认为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责,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在这方面无所谓左中右之分。中国如果不够强大,早晚还要再受日本的侵略,对此必须时刻警惕。与日本在战争罪行问题上的斗争,必将长期存在,延续到新的世纪,这是不可避免的。

不同的观点认为,右翼在日本社会的比重究竟多大是另一回事,把日本民族整体看做残忍成性是不合适的。对日本右翼的斗争在中日关系中居于何种地位,要从全局慎重考虑。重要的是研究清楚历史事实,用事实教育和争取两国的青少年。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宁一指出,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一定要追究。但要正确区分战争头目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多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桧林教授提醒人们要正视狭隘民族主义的盲目性。日本民族有自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日关系也不仅仅是一片黑暗。日本继承发扬了多少中国的传统文化?晚清以降有多少中国人去日本留学?从日本传来了多少新思想?这些方面也应加强研究,我们要对日本多数人讲话,要心平气和。应该向他们讲清日本怎样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哪些具体的伤害,给日本人民也带来哪些具体伤害。除了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以外,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开拓。对于中日关系来说,这些也是很重
要很基本的问题。

(作者侯晓佳,197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牛大勇,195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